



五七干校研究

Study on the May Seventh Cadre Schools

张绍春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五七干校研究

Study on the May Seventh Cadre Schools

张绍春 著

责任编辑：赵圣涛

封面设计：毛 淳 徐 辉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七干校研究/张绍春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7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01-019336-6

I. ①五… II. ①张… III. ①干部下放劳动-研究 IV. ①D6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5022 号

五七干校研究

WUQI GANXIAO YANJIU

张绍春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0.5

字数:540 千字

ISBN 978-7-01-019336-6 定价:10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7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五七干校产生与兴办的原因和背景	21
第一节 国际环境:苏联出现特权阶层与西方实施和平演变	21
第二节 历史铺垫:1957—1965 年中国开展了干部下放运动	25
第三节 理论基础:“五·七”指示成为全国的纲领性文件	33
第四节 现实需要:广大“靠边站”干部迫切需要重新安置	44
第五节 政策驱动: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发布	48
第二章 五七干校的产生与兴办	51
第一节 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创建与成名	51
第二节 大陆各地争先恐后地大办五七干校	67
第三节 中央机关和军队竞相大办五七干校	144
第四节 兴办五七干校的配套措施相继出台	185
第五节 五七干校接二连三地开展政治运动	198
第六节 第一次中央机关五七干校会议前后	204
第三章 五七干校的调整与巩固	220
第一节 五七干校的涣散与教育对象的大调整	220
第二节 批林整风的开展与教学方面的大调整	240
第三节 五七干校领导体制与财务管理的调整	250
第四节 中共十大前后五七干校地位逐渐巩固	257
第五节 在轮训在职干部中陷入三大运动误区	265
第六节 江青集团加强对五七干校的控制利用	281
第四章 五七干校的衰落与停办	291
第一节 在批判“四人帮”中五七干校地位被撼动	291

第二节 在破除“两个凡是”中五七干校走向停办	304
第五章 五七干校的办学模式	320
第一节 推行“三条途径,一个目的”	320
第二节 将大批判作为动力贯穿始终	345
第三节 实行准军事化的管理与作风建设	357
第六章 五七干校的社会影响	371
第一节 政治上的负面影响	371
第二节 经济上的负面影响	382
第三节 文化上的负面影响	393
第四节 某些客观上的正效应	405
结 语	419
附 录 五七干校大事记	430
参考文献	457
后 记	479

绪 论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产物,产生之时被当作“新生事物”大力推介。它曾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强烈震动,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世界上也名噪一时。在五七干校学习、劳动过的干部、知识分子,来自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各个行业,人数众多,牵涉面极广:不仅有一般干部,而且有一批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干部;不仅有一般的知识分子,而且汇集了教育界、理论界、科技界、文化界、卫生界的学术权威和名人。五七干校究竟是不是新生事物?它为什么能够产生和兴办?它是怎样发展变化的?它的办学模式是怎样的?它究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应该如何评价它?这些问题正是本书所要探讨的。

本书由笔者2008年5月答辩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五·七”干校研究》增订而成,当中许多部分作了大幅度增订,但也有一些部分增订不多。绪论部分属于后一种情况。特别是研究综述的“进展及争鸣”和“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部分基本上维持了原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旦对其增订,将难以说明本课题研究是在什么样的学术背景下开展的,难以较充分地体现此项成果的创新之处。

一、研究综述

(一) 成果述略

1. 一些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相继发表

截至2012年6月,国内外研究五七干校的学位论文有6篇,期刊论文有近30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有2篇,分别是笔者的《“五·七”干校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8年5月)和张磊的《历史在这里沉思——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研究》(武汉大学2010年5月);硕士学位论文有4篇,分别是陈希的《五七干校研究——从干部教育模式角度分析》(北京大学2006年5月)、张延明的《五七干校的历史考察:源起与概貌》(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5月)、张震的《文革时期“五七干校”若干问题研究——以北京市西城区五七干校为例》(北京大学2008年6月)和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 Lan Jiang 的《A critical study of the May 7 Cadre Schoo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1989年)。期刊论文方

面,发表最早的是郑风的《五七干校也要彻底否定》(1984年);其余均发表于2002年之后,主要有陈虹的《中国作家与五七干校》、谭解文的《一页沉重的历史记录——五七干校里的中国作家》、崔金亮的《河北省五七干校始末》、郭小林的《“我拯救了我的灵魂”——郭小川在五七干校期间的思想历程》、陈漱渝的《向阳无湖 干校无文——兼议“干校文化”》、陈辽的《论“干校文化”》、孙君恒的《中央在湖北沙洋五七干校的回顾》、霞飞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七干校》、郑谦的《五七干校述论》(一、二)、李城外的《1968年:中国五七干校之滥觞》、戴英历的《党校与五七干校合并培训干部略考——以桂林为例》、王永华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纪事》、单长江的《“流囚”在五七干校里的心路历程》、黄金魁的《毛泽东“知识分子工农化”思想在“文革”中的实践——以五七干校中的知识分子为考察对象》、刘保昌的《干校文学论:以向阳湖五七干校为中心》、笔者的《从经济层面看五七干校的负效应》和《举办五七干校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上述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五七干校的研究起步较晚。

2. 一些史料相继整理和公布

已经整理和公布的史料可分为六类:

第一类是亲历者的原始记录,主要有:叶圣陶与叶至善父子的《干校家书》、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张光年的《向阳日记》、孙越生的《干校心踪》、陈敏之和丁东合编的《顾准日记》。

第二类是亲历者写的纪实作品,有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何金铭的《走进炼狱》、赵丰的《红色牛棚——中国五七干校纪实》、杨静远的《咸宁干校一千天》、战凤翰的《柳河五七干校纪事——中国第一所五七干校的命运》、星火和晓萍的《燃烧的青春——柳河五七干校的知青生活》、火星的《残破的世界》、徐方的《干校札记》。当中史料最翔实、史学价值最大的是原柳河五七干校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战凤翰的著作《柳河五七干校纪事——中国第一所五七干校的命运》。

第三类是组织史资料,目前只有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史资料编纂办公室组织编写的《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组织史资料(1968.5—1979.10)》。

第四类是回忆资料汇编,主要有20本书: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咸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的《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史料专辑》、咸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咸宁市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合编的《向阳湖文化专辑》、荆门市与钟祥市的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合编的《荆乡遗梦》、信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五七干校在信阳》(上、下)、潢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厚重黄湖——团中央五七干校专辑》、李城外编的《向阳

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上、下)、《向阳湖纪事——咸宁五七干校回忆录》(上、下)、唐筱菊主编的《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阎纲等人编著的《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江惠生和黄伟宗主编的《英州夜话 知名文化人在英德五七干校的日子》、张俊滨主编的《团泊洼岁月——中央文化部团泊洼五七干校杂述》、战凤翰和陈桂琛主编的《亲历柳河——柳河五七干校的回忆与思考》、郭德宏等编的《我与“五七干校”》、林阳等著的《童年的干校》、苏智良主编的《上海五七干校忆往》、段小河主编的《永痕的记忆——钟祥五七干校纪实》、中共沙洋县委党史办公室主编的《记忆——沙洋五七干校》。

第五类是采访资料汇编,共有4本书:李城外的《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上、下)和《话说向阳湖——京城文化名人访谈录》、贺黎与杨健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

上述39部著作中,公布最早的是杨绛的《干校六记》(出版于1981年);其次是《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组织史资料(1968.5—1979.10)》(内部发行于1989年);其余均是1995年以后才公布的。这反映出,直到1995年后,五七干校的史料整理工作才开始真正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第六类是零散的回忆资料。这些资料散见于各种报刊。截至2011年7月,中国知网数据库共有78篇此类文章。

3. 一些五七干校纪念馆相继建立

受五七干校研究的推动,一些地方开始保护、挖掘和抢救与五七干校有关的历史文化资源。湖北省咸宁市最早行动,将原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旧址保护性地开发为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并先后成功地将其申报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黑龙江省柳河农场和庆安县共同投资修建柳河五七干校历史博物馆。同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委、市政府建起了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学校历史博物馆,馆内陈列了1200多件史料。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团中央黄湖五七干校、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等纪念馆的建设工作也在推进之中。这些纪念馆一方面提高了这些地方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也保护和发掘了一批实物史料,激发了人们对五七干校的研究兴趣,加深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危害性的认识。

此外,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席宣与金春明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等著作也对五七干校作了简略的论述。

(二) 进展及争鸣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五七干校研究上的进展及争鸣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1. 关于五七干校产生和兴办的原因

对于五七干校何以能在全中国范围产生和兴办,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郑谦认为,五七干校的产生,不仅是“文化大革命”一些基本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当时解决诸多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五七干校产生的现实原因,首先在于大量精简下来的干部需要进行必要的安置,其次在于有更为广阔的背景:全国各地开始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各大、中城市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又动员城镇居民到“农业第一线去”;1969年因苏联军队在中苏边境挑起流血事件,全国展开了全面的战备动员工作,大中城市开始大规模地疏散人员。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汇集起来,使中国顿时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城市人口向农村流动的高潮。五七干校的产生,还与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的理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①

陈辽则认为,五七干校能在中国办起来,而且只能在中国办起来,除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大环境的外部原因外,还可以而且必须在国民性的负面上找深层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忽视了与国民性中的负面、阴暗面作斗争,也就必然导致它的恶性发展,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了国民性的负面、阴暗面的大发作、大展览。具体到五七干校,除了少数干部和知识分子仍然充当“中国的脊梁”,坚持“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者外,多数干部和知识分子却暴露了、发展了国民性中的负面、阴暗面。这些负面、阴暗面主要有“天皇圣明”“臣罪当诛”、等待恩赐的国民性和“窝里斗”。五七干校办得成,“文化大革命”发动得起来,还与知识分子失去“自由职业”身份有关。“文化大革命”前,“自由职业”这一阶层已不存在了,知识分子都成了国家干部。既然端了国家的碗,就得听国家的管。所以,“文化大革命”一来,干部全都响应了“文化大革命”,文化系统6000余人全都下干校,没有一个敢反抗的。^②

此外,孙君恒对部分中央机关、部队和北京高校为什么会选择在湖北沙洋建起27所五七干校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政治原因。“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导致干校的大量出现。第二,沙洋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与良好的水土资源。第三,出于备战的安全考虑,一些准备将干校建在东北的中直机关,纷纷选择沙洋这个地处中原腹地的“风水

① 郑谦:《五七干校述论》(一),《百年潮》2006年第9期。

② 陈辽:《论“干校文化”》,《咸宁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宝地”创办五七干校。第四,沙洋劳改农场已经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①

2. 关于“干校文化”问题

对于在五七干校发展过程中是否产生和存在“干校文化”,学术界目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五七干校的发展历史上存在着“干校文化”。陈辽认为,“当时,我国的各级干部约一千多万人,进五七干校的少说也在五百万人以上。这五百多万人集中在五七干校,很自然地形成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先知先觉的人们称之为‘干校文化’”。“干校文化”中既有封建的、专制主义的、反人性的文化,也有对抗这种文化的自觉的、正气的、呼唤民主的文化,要求早日结束干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文化。^②

陈虹也赞成五七干校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她将“干校文化”的内涵归纳为:在劳动中净化自己的心灵,在苦难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蛮荒中展现美好的人性,在混沌中坚守文化的阵地。^③

第二种观点认为,五七干校的发展历史上不存在什么“干校文化”,“干校文化”的提法不妥帖。陈漱渝指出,就一般人而言,大多是从创造而不是从破坏的意义上理解“文化”的。所以,尽管中国历史上有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记载,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柏林国家歌剧院也发生过希特勒焚烧著名典籍的事件,但不会有人将这些称为“焚书文化”。老作家张光年留下了《向阳日记》,陈白尘留下了《牛棚日记》,这些毕竟只具有史料价值。诗人臧克家的《忆向阳》诗集,其实是他的一种人生体验,读者从中受到感染的也是一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精神状况,其意义已经超越时空而远非“干校文化”的概念所能概括的。杨绛的《干校六记》之类作品,更是属于一种反思历史的文字。总之,五七干校是文化的劫难,五七干校的生活本身不宜称之为“文化金矿”。^④

3. 关于五七干校历史的阶段划分问题

贺黎和杨健将五七干校的历史划分为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干校的草创时期(1968、1969、1970年)。其特点是生产环境艰苦,“阶级斗争”严峻。第二个时期是干校的波谷时期(1971、1972、1973年)。其特点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几乎所有的干校都从巅峰逐渐跌落下来;上自工、军宣队,

① 孙君恒:《中央在湖北沙洋“五七”干校的回顾》,《民主与科学》2005年第6期。

② 陈辽:《论“干校文化”》,《咸宁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③ 陈虹:《中国作家与“干校文化”》,《咸宁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④ 陈漱渝:《向阳无湖 干校无文——兼议“干校文化”》,《咸宁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下至一般干部,人心涣散;掀“5·16”运动停滞下来;先进与“五好”无人问津。第三个时期是干校的晚期(1974、1975、1976年)。“这一时期一方面已面临崩溃的边缘,是强行维持的。另一方面力图使其在组织上完善,理论上成熟。”^①

郑风认为,五七干校的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1968—1971年为干部下放劳动、斗批改阶段;1972—1976年为坚持“三条途径”的轮训干部阶段。^②

战凤翰、贺铨则将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8年5月—1972年1月,以广大干部下放劳动为主的阶段;第二阶段,1972年1月—1979年1月,轮训在职干部阶段;第三阶段,1979年1月—10月,停办阶段。^③

另外,崔金亮、李洪荣将河北五七干校的变迁历史划分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期、五七干校时期、结束时期。^④

4. 关于五七干校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内容问题

郑谦认为,五七干校的教育方针最早由柳河五七干校提出,即以“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作为办校的方针,以抗大为榜样,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培养造就一批永远忠于毛主席,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新人。后来,它又被概括为:组织学员通过结合现实斗争认真看书学习、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插队锻炼这样三条途径,达到改造世界观的目的,即“三条途径,一个目的”。五七干校的教育包括三个基本的方面:下放劳动、学习与运动、插队锻炼。除了以上三项基本的教学内容外,五七干校还强调干部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参加生产劳动,以期改变官僚主义作风,密切干群关系。^⑤

5. 关于五七干校学员问题

目前对五七干校学员的研究有以下共同点:都着重剖析和把握五七干校学员当时的心态和思想历程,并从这一维度来划分五七干校学员的类型。

陈虹以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为个案,分析了作家们的心路历程。在进

① 贺黎、杨健采写:《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3—5页。

② 郑风:《“五·七干校”也要彻底否定》,《天津市管理干部学院校刊》1984年第8期。

③ 战凤翰、贺铨编:《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组织史资料》,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史资料编纂办公室1989年版,第6—8页。

④ 崔金亮、李洪荣:《河北省五七干校始末》,《档案天地》2002年第S1期。

⑤ 郑谦:《五七干校述论》(一),《百年潮》2006年第9期。

入五七干校之前,这些人的心态可划分为战天斗地型、脱胎换骨型、政治避难型三种形态和类型。在进入干校之后,他们的心态又演变为另外三种形态和类型:“当年的‘矢志不渝的虔诚’开始动摇”、“当年的‘难以排遣的哀怨’转为坚忍”、“当年的‘宁折不弯的抗争’更继续下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些人的心态又转变为沉痛的反省、深刻的忏悔和历史的深思三种形态和类型。^①

陈辽主张,要具体分析五七干校学员的文化心态。他将这些人的心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极少数人的文化心态,他们掌握着对于校学员命运生杀予夺的权力,视干校为自己发迹的基地,他们的文化心态是“五七干校就是好,就是好”。第二类是在干校深受迫害的一部分觉悟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以萧乾、张光年、洁泯、张惠卿、阎纲等人为代表。第三类是大多数人的文化心态,这是一种处于从不觉悟到觉悟的过渡型的文化心态,具体又包含五种心态:其一,以为到干校,是为了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其二,是把干校当作避风港的文化心态;其三,在干校心静如水,既不激动,也不悲观,极目蓝天白云,对视绿水青山,冷眼观察“文革”的发展;其四,“身在向阳湖,心系周总理”;其五,也有极少数一部分人,他们在干校“解放”较早,干的劳动较轻微,离开了政治气氛压抑沉闷、缺少安全感的北京,来到咸宁,顿觉天地开阔,因此对于校生活颇为习惯,在向阳湖写了不少诗篇。^②

郭小川之子郭小林对郭小川在五七干校期间的思想历程作了研究。他认为,1970年新年到1971年9、10月份,是郭小川尚未觉悟的时期。这时期的郭小川确实是满腔热情地参加劳动锻炼,接受思想改造。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后,郭小川有了初步觉醒。1974年8月至1975年10月,是郭小川在斗争中寻找灵魂的时期。这一时期郭小川失去人身自由达14个月之久,他的思想认识已从对于校军宣队错误做法的质疑上升到了对“四人帮”文艺方针的否定和批判。^③

6. 关于如何评价五七干校问题

学术界在究竟应该如何评价五七干校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是否定为主、肯定为辅的观点。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① 陈虹:《中国作家与“五·七”干校》,《书屋》2002年第3期。

② 陈辽:《论“干校文化”》,《咸宁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③ 郭小林:《“我拯救了我的灵魂”——郭小川在五七干校期间的思想历程》,《神州》2004年第7期。

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一本党史权威著作。该书认为,“大批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在各种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虽然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是长时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耽误了在这些方面学习和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的损失也很大”。^①

第二种是纯粹否定的观点。目前学术界持这种观点的人相对较多。席宣与金春明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认为,“在‘精简下放’的名义下,把大批干部、教师、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新闻出版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等等,送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接受所谓‘贫下中农再教育’。使许多国家急需的有用人才,精力和时间付诸东流。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派性的支配,这种下放干部的办法,往往成为排除异己、惩罚干部、摧残知识分子的措施。”“结果这次精简下放,既花费了国家的大量财力和物力,又使成百万干部经受了一场磨难。不仅没有真正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反而造成各方面工作上的损失和许多不良后果。”^②

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一书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事实上,‘干校’并没有使干部‘革命化’,相反成了迫害干部、惩罚知识分子的场所,成为反对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不准钻研业务和技术的一种手段。”^③

郑风早在1984年就提出对五七干校也要彻底否定。针对有的人主张“对1972年之后的五七干校,不仅要有否定的一面,而且要有肯定的一面”,他进行了反驳。他分析了1972年五七干校实行的“三条途径”,认为在干校里学习马列著作,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三个正确对待”“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其次,五七干校社会调查的主要问题,是所谓的“一大二公”的优越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农业学大寨”等,都是用以说明资产阶级法权是“走资派”产生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走资派”存在的阶级基础,使人们加深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解,为“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再次,干校里干部参加劳动是作为“继续革命”的重要内容,是“反修防修”的战略措施,是“劳动惩罚论”的继续和延伸。这“三条途径”是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再教育”的,是假借学马列、搞调查、参加劳动,进一步灌输极“左”思想,是完全为“文化大革命”政治需要服务的。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13页。

②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192页。

③ 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240页。

同时,他又强调:“彻底否定‘五七干校’,绝不是说‘五七干校’的办校人员都是‘罪人’。‘五七干校’的办校人员,绝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是错误路线的執行者,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①

(三) 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来看,五七干校决不亚于同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而从研究来看,尽管五七干校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和进展,但它却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不管是论文发表、专著出版,还是资料整理、研究力量,都根本无法与后者相比。客观地讲,五七干校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研究广度拓展得不够

从已有的五七干校研究来看,研究范围还比较狭窄。其一,论文数量较少,仅有30多篇,还没有一部研究专著。其二,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运用存在着很大局限性,很少公布和使用档案资料。例如,中央机关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这方面史料应该很多,但公布的、能见到的却很少。再如,广东创办了313所五七干校,湖南创办了120多所五七干校,辽宁创办了87所五七干校,上海创办了40多所五七干校,按理来说,档案资料应该很丰富,但现在很少有人搜集和运用它们。已经公布的大多是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的资料,其他史料则散见于各种回忆录、纪实作品。这也使得研究者对非档案类史料的依赖性很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五七干校研究的广度。其三,研究的对象过于集中。已有的研究多为个案研究,综合的通论性研究较少。具体地讲,主要还是侧重于研究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侧重于研究五七干校中的文学家群体及个人,而全国五七干校综合研究及各省、市、县五七干校研究的成果甚少。

2. 研究深度突破得不够

现有的五七干校研究成果中,有深度的还较少,一些书籍、文章认识流于肤浅,甚至存在着明显的谬误。

其一,对五七干校产生和兴办的原因还缺乏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五七干校的产生与“五·七”指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已有的研究很少触及这一问题,即便触及也往往是浅尝辄止,几句话就带过去了。有的研究者竟把“五·七”指示看成是一封普通的信,还说:“及至后来出现了‘四人帮’,林彪与之既矛盾又勾结,他们于1968年起全面落实‘五七指示’,从

^① 郑风:《“五七干校”也要彻底否定》,《天津市管理干部学院校刊》1984年第8期。

此,各省、市、自治区、各行业,办‘五七干校’成风,以致地区、市、县也办起了‘五七干校’”^①。这一观点与事实严重不符,第一,“五·七”指示不是一封普通的信,它里面的观点是毛泽东经过长时间酝酿才提出来的,它反映了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和渴望,它是“五·一六”通知的姊妹篇,这一点理论界已有定论;第二,1968年,“四人帮”还没有形成;第三,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的勾结同五七干校产生和兴办之间不存在着因果关系。笔者认为,要加强五七干校产生和兴办的原因的研究,解决如下这些问题是很有必要的:“五·七”指示的发表与五七干校的产生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中国1957—1965年这一段历史与五七干校的产生和兴办有着怎样的关系?五七干校的产生和兴办的现实原因和政策动力是什么?

其二,对全国五七干校演变历程还缺乏深入的研究。贺黎、杨健的划分方法和郑风的划分方法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把五七干校停办的时间都定在1976年,这一点与事实出入很大。显然,他们对五七干校1976—1979年的历史缺乏研究。可以肯定,他们没有看过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不知道该文件专门对五七干校工作作了规定;他们也没有看过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此外,崔金亮、李洪荣将河北五七干校的历史划分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期、五七干校时期、结束时期,这种划分方法很值得商榷,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五七干校尽管有一定联系,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历史算作五七干校历史的一个阶段。

其三,在评价五七干校的问题上,已有的研究还显得相当简略和粗糙。对于五七干校究竟是怎样影响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问题,还缺乏较为详细的、系统的研究和论述。

其四,其他还有许多与五七干校密切相关的问题,研究不深,或很少被研究,甚至没有被研究。如五七干校的分类、五七干校的办学模式、极“左”势力与五七干校的关系、“九·一三”事件对五七干校的影响、五七干校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关系、五七干校与牛棚的关系等等,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从《红色牛棚——中国五七干校纪实》这本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出,作者竟然把五七干校与“红色牛棚”等同起来。事实上,二者差别很大。再如,有的论者说“三条途径,一个目的”是五七干校的教育方针,其实不然,它只是五七干校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上述这些状况都要求五七干校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① 陈辽:《论“干校文化”》,《咸宁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3. 研究力量较为薄弱

从五七干校研究队伍的规模来看,人数很少,迄今为止也只有十几人。从五七干校研究队伍的组成来看,文学工作者居多,而史学工作者明显偏少,同时还有待政治学者、社会学者、文化学者的加入。

二、研究价值

笔者认为,加强五七干校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 学术价值

五七干校历史既是“文化大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五七干校研究在上述领域研究中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然而,目前对它的研究还很薄弱,取得的成果也较少,还没有出版一部研究专著。基于此,加强五七干校的研究将有助于拓宽和深化“文化大革命”史研究,有助于加强和丰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同时对于深化毛泽东晚年思想研究也会大有裨益。另外,尽管到目前为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一直以来对五七干校中的知识青年群体鲜有研究。事实上,全国相当多的五七干校都有为数不少的知识青年,他们在组织管理、生活学习等方面有着自己的特色。加强五七干校的研究,无疑会进一步深化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

(二) 现实意义

加强五七干校研究对于在现实中进一步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就一直面临着两大历史性课题: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毛泽东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毕生试图破解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他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问题一直高度警惕。他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与他过度地忧虑干部队伍,错误地分析干部队伍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之所以会大力号召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进五七干校学习,与他错误地认定“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进五七干校“重新学习”是破解两大历史性课题的重要措施有着紧密的关系。实践证明,让广大干部进五七干校,根本无法破解两大历史性课题。尽管五七干校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留下的教训却值得我们吸取。时至今日,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所要根除的官僚主义依然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顽症,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这就需要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包